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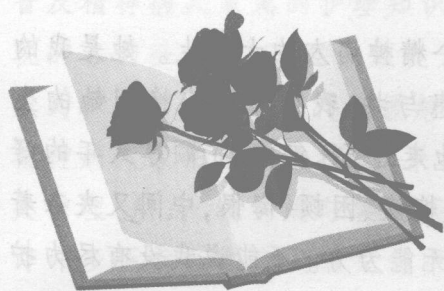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足迹丛书 主编：刘正刚

翡翠人生

赵根楠 著



華齡出版社



自序

作为生活在自然空间的每一个人，一辈子不生病的大概没有。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，科技的发达，防治疾病的手段不断改善，也使得绝大部分人并不惧怕疾病。

然而，有一种特殊的疾病，至今尚无法查出其病因，而且在近年有逐步增多的趋势，这就是精神分裂症。2005年，在“世界精神卫生日”期间，从多种媒体上可以看到以下内容：“全世界至少有2%的人口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，我国目前有1600万人。”“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发展，我国精神疾患在增多，精神疾病已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，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%。”另据报道：“全世界有1.21亿精神病患者的后备军——精神抑郁症患者”。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！

所谓“疾病负担”，大概指的是经济负担，可是在这种经济负担的背后，还有着超过这数字不知多少倍的人的精神负担。每个精神病人的背后至少有3~4个亲属背负着沉重的压力，一种无形的锁链牢牢地捆绑着他们，给他们的

生活、工作、学习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,这是无法用经济手段测定出来的。

我在这里记叙的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大半生。她是我的夫人,30年同床共寝,忧患与共,我终于没能挽回她的生命。她在这世上匆匆忙忙地走过58年,到了颐享天年的好时光,她走了。这常常使我愧疚、困顿、悔恨,中间又夹杂着更多的无奈和身心交瘁而无能为力。不能说我没有尽力护卫,也不能说我没有尽职尽责,但在对她的生命维系过程中,有许多的无知,特别是对护理方法上的无知,使我时常处在一种无所作为的尴尬处境中,再加上一些其他疾病的干扰,常常是顾此失彼,乱了方寸。

每当我回忆起送她走进墓地的那一天,帮我们料理后事的墓园接待人员的话语:“可惜啊,走得早了些。”这话语像一把刀子戳在我心上。

大多数精神病人是在家中走完他的一生的。1600万精神病人的后面大约有6000万的亲人,是他们的监护人、护理员、守卫者。人们大概很少想到,精神病人的自耻感,病人的家属何尝没有。每当你陪伴着病人走过大街小巷时,围观的人们流露出怪异的眼神,特别是一群无知的孩童们“快来看疯子啊”的哄闹声,你只能自愧地低下头忍受着这种耻辱。

精神病是人类几千种人类疾病中的一种。精神病人除了需要每月一次的复诊和开药,或者急性期的4个月的临床治疗,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与亲人朝夕相处。大

力培养精神科医生,提高医疗水平固然重要,然而如何普及精神病人家属的护理知识,让他们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征兆时,不至于颓丧无奈、束手无策,而是用有效的护理方法使病人得到缓解则显得尤为急迫。大多数精神病人最怕住院治疗,如果家庭成员有足够丰厚的有关护理、用药、精神病与其他疾病共生时的相关知识,也许许多不幸会在亲人的关爱中得到化解,因为只有亲人才最了解病人。这种比较深入一步的知识的获得需要医院的宣教和有关媒体的推广,各种临床治疗经验的总结和介绍,这样做将会给社会给人民生活的安宁带来极大的好处。这就是我写本书的初衷。







目 录

1	相逢何必曾相识	1
2	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	19
3	考验	27
4	同情、理解、关爱	45
5	凭栏十里远眺香山	77
6	假若明天来临	93
7	第三次打击	103
8	最后岁月	127



1

相逢何必曾相识

JADE LIFE



北京的7月末,暑热难熬,只有清晨,在寂静的军队大院儿里,算是一天中最耐人留恋的时刻。

“老爸,昨夜我又梦见我妈了,仿佛又在家里做着奇特的动作,又跳又唱,嘴唇抹得红红的……梦醒时分,觉得怀里5个月的孩子在拼命动着,又踢又踹。这是妈在给我托梦吧,叫我要注意孩子,安安全全地生下来吧!”女儿小卉说。

我淡淡地应了一声。很奇怪,昨夜我也做了个奇怪的梦,梦见我的一位同事程光胜。我们从上世纪60年代初就在一起工作。他是个摘帽右派,那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。他曾说,当时给他划成右派时,他还很不以为然,直到分配到科学院后,一起分配来的同学工资是56元,他只有29元,才傻眼了。在“文革”中,我们一起去献血,第二天,我突然发烧,便住进了医院。下午,我躺在病床上,突然一个人推开了门,瘦削的脸,鼻梁上架着一付破旧的不知戴了多少年的近视镜,长方脸上显出南方人特有的白皙皮肤。哦,居然是程光胜,手里捧着一个大西瓜,那也是炎热的7月。

“你还敢来看我,不怕造反派批斗你?”我很高兴。平日诸多的好同事,谁还敢来看我?这是可以理解的。还是惺惺惜惺惺,我是反革命小爬虫,他是摘帽老右。

不知怎么,40年后,我突然在梦中又见到了他,仿佛我们俩在集体宿舍里闲谈,我向他讲述了夫人死亡的全过程,边讲边哭。不一会儿,我被自己的哭声惊醒,看看时钟,已是早晨5点多,我的脸上分明还挂着泪珠。

8点半左右,女婿已备好了汽车:“爸,走吧,还要先去买鲜花呢。”

我们一行人来到温泉墓园,这里三面环山,京密运河在山下流淌,泛着绿色的光彩,放眼东方,可望及京城郊区远近高低各不相同的楼群。今天是7月29日,一年前,妻子的骨灰被安放在这里。

我的妻子叫曹艳玲,我和她是在1973年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,那年我已34岁。

她单纯、善良,圆润的脸上时常露出一一种善意的微笑,眉眼俊秀,特别是眉宇间传达着她的质朴、爽直的性格。言谈话语中听得出她有些不大爱思考,做事喜欢自作主张,独行其是。有一次,我们在闲谈时,她笑着说:“原来我爸爸给我起名字叫延龄,可是我从小就喜欢鲜艳的颜色,更喜欢五彩缤纷的花,于是,我上学后自作主张地把‘延龄’改成了‘艳玲’”。

1945年,她降生在北京南城一个贫民家庭里。她父亲是一所小学校的普通职工,年轻时曾做过厨师。记得我第一次到她家去,她父亲做了几个菜,我很惊讶,这几个菜竟比得上饭馆里的香嫩可口。后来,她送我回去的路上,我问起了此事:“你母亲竟能做出这样色、香、味俱佳的菜肴,真不简单!”她淡淡地笑着:“我母亲不会做饭,只会煮面条,饭是我爸爸做的。他年轻时曾在一家饭店当过厨师。退休后,一直在家做饭。因此,我们从来没做过饭,谁也不会做。”



只是家里没钱，平常吃的很简单，今天你来了，才做了几个拿手菜，我们姐弟几个也跟着沾了光。”她笑得很甜，似乎又带着几分苦涩。

1973年，正是那场生灵涂炭的“文革”后期阶段。我每天早晨6点起床，先给患脑溢血的父亲擦洗、吃饭，随后便急匆匆地骑上自行车直奔30里外的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去上班，争取8点以前到，还能吃上食堂里的早餐。晚上下班回来已是7点。好在中午和晚上父亲有在附近上班的大哥大嫂伺候，然而终因卧床多年，不治而去。父亲的死，我们兄弟几个，谁也没敢表示过度的悲伤，他虽然是个旧社会的律师，却做过旧官吏，“文革”被错戴上地主的帽子。“文革”期间丧事不敢办，哪怕是简办也不敢，否则，也会惹来一顿“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”的辱骂。父亲的尸体火化后，我们偷偷地把骨灰埋在八宝山后山的一棵树旁，在树上做了记号。一切完毕后，我们兄弟几个一天还水米未沾，晚上，在南来顺饭馆吃了一顿馅饼，一个个才显得有点精神了，似乎从心底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，大概也包括父亲自己。记得鲁迅的一篇散文《父亲的病》里曾写道：“父亲的喘气颇长久，连我听得也很吃力，虽然谁也不能帮助他。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地想道：‘还是快一点喘完了吧！……’立刻就觉得这思想就不该，就是犯了罪，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，我很爱我的父亲。便是现在，也还是这样想。”

父亲祖籍河北涿县,12岁只身来到北京,就读于北京四中,后考入朝阳大学法律系,毕业后参加北京律师公会,做一名职业律师。解放前与北师大陆宗达教授过从甚密。陆宗达的女儿是北京中共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之一,1947年被捕,我父亲为她辩护,又通过一些熟人,终于将她营救出狱。解放后,律师公会被取缔,她不忘前恩,便推荐父亲去人民大学进修学院学习,此后找个合适的工作。父亲后来在工商联工作至60岁退休。谁知福无双至,祸不单行,没有两年,便开始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一片喊杀声中,父亲也未能幸免。因为祖父是地主,1955年病逝。于是,父亲便顶替祖父戴了顶五类分子第一名的“地主”帽子。一天,一个派出所的民警鼓动着不知哪个学校的红卫兵,把家里扫荡一空。不过退休费还是照发不误,那个年头就是这样怪诞:打砸抢是造反有理,退休金照发也算大难中的幸运。

父亲死后不久,大概是11月上旬,北京的天气有点凉了。忽然有一天,也在科学院工作的一个老同学张荫荪打来电话:“淑香给你介绍了个对象,星期日下午2点在中山公园门口见面,不见不散,记住了,换件干净衣服,精神点。”没等我回答解释,便把电话挂了。这事情来得有点突然,一时使我为难起来,原来我的一个表妹也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,并且把照片都给了我。事有凑巧,约定见面时间也是星期日下午2点。同时去见两个对象,一是时间巧合,二是有损我的做人原则。然而这个老同学兼同事,相处10



余载,是我的异族(回民)朋友,情同手足。淑香姓曲,是他的夫人。在我的印象里,学生时代,几乎每个星期天,我都是在他家度过的。他幼时丧父,母亲是个教师,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独自把儿子带大实属不易。“文革”初期,老张结了婚,淑香是个教师,性格开朗,爱说爱笑,一双眉眼更像维族姑娘。“文革”期间,我被拘留检查,不准回家,与家人失去联系,唯一敢去家里探望我的父母的就只有他们俩。当“文革”初期,红卫兵也闯进了回民的聚居地——牛街时,他的家里也险些罹难。红卫兵抄到他的家时,却被挡在门外。他的母亲双手叉腰,一改平时文静娴雅的气质,怒目圆睁,用她教书时练就的高嗓门呼喊着重:你们是哪门子红卫兵,敢抄老工人的家!红卫兵反被问怔了,你看我,我看他,一时没人答腔。带头的那个红卫兵小声说:“你是资本家的老婆。”她二话没说,跑回屋里,把早已准备好的一摞小红本拿出来:“看吧!我爷爷,我父亲是两代铁路工人,瞧啊!这是工作证,这是退休证……,你们敢抄老工人的家,你们是伟大领袖的红卫兵吗?”红卫兵一下子全蔫了下来,带头的喊了一声“走”,红卫兵们便像一窝丧家犬似的赶快蜂拥逃离。老街坊走过来说:那张大字报也不知道被谁撕下来了。

躲过了劫难的一家人,却更加关心起我来。于是才有了替我物色对象的念头。既然答应了下来,我是绝不能悔约不去见面的。第二天中午,我决定先去中山公园,等了半个小时,才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看见淑香说笑着陪着

一个陌生的女子走了过来,荫荪在后面跟着,像个保镖。陌生的女子是个小学教师,看上去是个较内向的人,只点点头,微微笑着,算是认识了。她看上去有30岁左右,瘦长脸,身材修长,虽然看不出有什么缺欠,但脸上却像是笼罩着一种说不出的黯淡的晦气。我胡乱地想着,大概和我差不多,也是在“文革”中家里遭遇过劫难的人吧!我陪着她们转了转,随便聊了几句家常,她的话也不多,于是我就假惺惺地看看表:“真对不起,我家里有些事,4点钟要赶到大哥大嫂家。”懂事的老同学便马上过来圆场:“行,你去吧!下次约会我再通知你!”我像受到大赦般地骑上自行车,直到他们看不见我了,才用最快的速度飞奔起来。10余分钟后,我到了槐柏树街,按门牌敲响了一个小四合院的门。这是事先约好的与她见面的地址。

出来开门的是一对热情的中年夫妇,听声音就知道是一对东北夫妻。他们很热情地把我带进了两间西房,里边是卧室,外边是客厅,客厅中间是一个取暖的煤火炉。坐在炉子后边的一个女子马上站了起来。

时间已经快到4点了,我迟到了一个多小时。主人拉出了一张木椅子让我坐下。我忙解释:“真对不起,我家里临时出了点事,耽误你们办别的事了。”我十几分钟前说了谎,这时还只能再接着说下去。不说谎不行,因为同时约会两个对象,这在当时是极不道德的事。

她只是站在一旁笑着。她的介绍人两口子像完成了一次使命似的,给我们沏上茶,然后把煤火炉封上一些,压上



一把大铁壶，“你们俩好好聊聊，我们出去办点事。”

屋子里是暖暖的，我们隔炉相坐，她像是怕我看她的脸，始终躲在煤炉烟筒的后面。

我们虽然都互相从介绍人那里知道了一些各自的底细，但也只是简单的寥寥数语。我首先打破这难堪的沉默，我想，既然介绍人提供了这样好的环境，我得把我的一切先说给她听，因为那时我还是个没“定性”的“阶级敌人”。

我先讲了我的前一段婚姻史。

那是1969年的事了。那年秋季，我被宣布去湖北“五七”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而且，根据林副统帅的命令，去“五七”干校改造是要落户一辈子，户口也要转过去。那时我想，走之前，我一定要找一个北京姑娘结婚，她可以留在北京，我把这想法跟几个同事说了，没想到，半个月內这想法竟奇迹般地办成了。一个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子，年龄和我差不多，只是因为心脏有点毛病，没有正式的工作。我说没关系，我的50多元工资还是养得起一个人的。

我们约好在西单商场对面的无轨电车站见面。一般来说，不管是什么约会，或办理什么事情，我从来不会迟到的。在约定的时间还差十几分钟时，我来到了西单商场对面的车站。其时，正好来了一辆车，等车开走后，我看见一个原来就蹲在那里的女子还没起来，车站上就剩下我们两人。她见我在看她，便有些吃力地站了起来。她有一张圆圆

的脸,眼似杏仁,眉毛平直,淡淡的,面色苍白,只是两颊通红,似乎要渗出血来,我暗暗地想到,好像这就是心脏病人的特征。大概是蹲的时间太长了,满脸倦容。我很惭愧,总不能让一个女同志等我:“怎么来得这么早,等了好长时间了吧!真对不起!”我见她疲劳的样子,走上前,道了歉。她也不善言词,我问及她的父母,她说父亲是水利部的干部,解放前当过八路军的连长,现在靠边站了。这一点似乎打动了我的心,起码,她是革命者的后代,是红五类,她的安危我是不必担心的。因为家庭出身使我在“文革”中吃尽了苦头,也许我真的需要找一个革命家庭的子女做伴侣。我虽然暗暗地担心她的心脏病会有怎样的危险,但想到只要她不做过累的工作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
我心里七上八下,不知该怎么好,当看到她期盼的目光时,我的心软了。我想,我会和她父母商量好,怎样更好地维护、治疗她的病体。刹那间,我下了决心,难道我连一个女人都养活不了吗?而且我已无法拒绝她,再有半个月,我就要到湖北潜江“五七”干校去了。结婚吧!我已别无选择。

“她是姓姜吧!听说她后来在武汉病逝的?”艳玲突然抬头看了我一眼。“是的,”我本不想再回忆那段可怕的历史,然而她既然问到了,我必须如实地告诉她亡故的真相:“那是1971年春天,她在北京找不到工作,便要求也来‘五七’干校当家属,安家落户,她儿时生长在山东农村,对农活并不生疏,如果能来湖北,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,



也是一种锻炼。我和她父母亲商量后，便把她接来了。”那时是1971年的5月初。

湖北的5月，已经实实在在的是夏暑季节了，尤其这干校所在地原就是个低洼地，比汉水还低十几米，只要一溃堤，这里便会成为泽国。天气闷热难耐，树叶儿一动不动，那种特有的“静风”天气，外地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。刚来时，好像她心情很好，也和大家一起锄锄地，锄锄草。大家也很关心她，干一会儿就催她回去了。到了6月中旬，这里的酷热难耐，好人都喘不过气来，别说心脏病做过手术的人了，她20岁时曾因二间瓣狭窄、心室纤维性颤动而做过一次开胸手术。遇到这种天气，常常是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

潜江“五七”干校原是关押国民党军队校尉级被俘军官的。“文革”一来，便都被遣送回乡，原有的住房虽然简陋，但毕竟比“五七”战士睡的稻草棚好多了。没有煤炭，只能用锯末放进灶眼里烧饭，有时夜里下了雨，干的锯末找不到，就拼命地扇风，几乎每家屋前都弄得烟尘滚滚。我觉得这样下去对她身体极其不利，便劝她回北京。但是她说户口已经迁来了，而且家里准备了药，没关系。然而我心里总是不踏实，向连里反映，可谁也做不了主。

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，一天下午，两位排长——原所党委的两位副书记，问及了她的病情，顺便递给我一封电报。电报是姐姐从北京发来的，大意是母亲病逝，如能回来，望速归。我大吃一惊，看了看下面的发报时间，竟是半

个月前发来的。“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！”我有些发急，我惊愕地直视着他们，“难道我连知道母亲病故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！”我大吼一声，把锄头重重地砸向一棵果树，大声嚎哭起来。旁边的几个“牛鬼蛇神”赶忙跑过来，拉着我：“不是不告诉你，看你媳妇儿那样子，你能回去吗？”“妈，我对不起你老人家，我再也看不到你了。”这时我忽然想起考大学时的作文题——我的母亲。那还是1956年，我只有17岁，我觉得母亲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除了给我们姐弟6人忙活外，好像她没什么特殊之处。于是，我把作文题中的母亲，写成了我的祖国，祖国就是我的母亲。现在母亲没有了，我不过是个替换国民党军官开发这块低洼地的囚徒。

夜深人静，我一个人在果树林里面北而跪，静静地磕了3个头。没有纸可烧，只是那雪白的梨树花瓣一片片落下来，算是苍天替我撒的纸钱吧！

母亲走了，我这时更感到小姜病体的严重性，这样耗下去，她的身体很可能支持不下去。

人在走投无路时，常常会异想天开，办法也常常是这样逼出来的。第二天，我毫不犹豫地给北京中国科学院军宣队写了封信，介绍了我和小姜在这里的一切。原来并没抱什么希望，碰碰运气看的。没想到一周后，军宣队竟给“五七”干校的校长打来长途电话，校方向我们连长传达了三点决定：1、学校必须保证她的安全；2、让小姜的爱人亲自送她回京；3、户口随后转回北京。校方不敢怠慢，便委派了一名40多岁的女党员陪我们一同去了武汉。船到武汉